

“山戎”之名：早期辽西族群的名同实异

苗 威

(山东大学 东北亚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山戎”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三大原始族群之一，主要活动于西辽河、大凌河一带。至周代，“山戎”之名所对应的族群不仅居地转至七老图山、延庆、张家口市以西以及迁西之间，而且族群也已经改变。故而以周朝为限，将山戎分为“古山戎”与“周山戎”，其分化与重组有土著族群本身的因素，也与当时时代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关键词〕 山戎；辽西；周

〔中图分类号〕 K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9) 03-0077-07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9.03.009

从传说时代至春秋时期，“山戎”绵延数千年，曾经与“肃慎”以及“发（發）”共同构成我国东北地区的三大原始族群^①，也是商周王朝北部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朝建立之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山戎成为封于燕山南北的燕国来自北方的重要威胁，也是后来齐国北伐的直接目标。学界前贤对山戎多有关注，吕思勉、蒙文通开启了对山戎研究的序幕。^②几乎同时，国外学者通过在张家口、承德一带采集到的文物关注到了山戎文化。^③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山戎考古也取得了较大进展。^④但由于文献记载笼统而含糊，尤其是未作区分地将纷繁的史事

以“山戎”统之，导致认识纷纭，误差较大。据《大戴礼记·五帝德》载，舜以其贤而致天下格局稳定，在其所抚慰的四方之民中，北方主要族群是山戎、发、息慎。由此可知，山戎在唐虞之前已经活动于我国的北方。对于唐虞之前的山戎，我们以“古”冠之，称之为“古山戎”。据《左传》载，“齐人伐山戎”，^{[1] [P.2888]}《国语·齐语》对此事的记载较为详细：齐桓公即位之初，着力经营东南方，使“荆州诸侯莫敢不来服”，随后“北伐山戎，剌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韦昭为《国语》作注称“山戎，今之鲜卑，以其病燕，故伐之。”这里同令支、孤竹一

〔收稿日期〕 2018-07-03

〔作者简介〕 苗威（1968-），女，吉林梨树人，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历史。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专项“中国与朝鲜、韩古史体系冲突研究”（项目编号：17VGB005）阶段性成果。

^① “族群”往往与西方的 ethnic group 相对应，从现代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解读视角，其有复杂的内涵，学界也争论不已。不过，在中古之前，尤其是商周之际，未形成明确的政治势力的“族群”，有别于今天的“民族”，因为从原生性的角度而言，与“族群”同根同源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因为拥有高级的宗教或文明，具有高于族群的、稳定的、不易同化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形态，即使在民族主义的时代，依然寄生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许纪霖《国族、民族与族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如何可能》），其普遍性的共识民族是从英文“nation”转译而来的概念。尽管“民族”同时属于古汉语词汇，表达宗族和夷夏之辨（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但其与政权实体的对应性意蕴更为明显。《左传》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本文对于辽西的“族类”，以族群称之。

^② 参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书局1958年版。
^③ 参见[瑞典] Johan Gunnar Andersson《Huntngmagic Inx the animal style》，《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1932，（4）；Johan Gunnar Andersson《Selested ordoc brknzes》，《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1933，（5）。[日]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1册，新时代株式会社1935年版；滨田耕作《东亚文化の黎明》，东京：刀江书院1930年版。

^④ 参见郑少宗《河北滦平发现山戎族墓葬》，《光明日报》1977年12月9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第8期。

起被齐桓公讨伐的是春秋时期的山戎，为相区别，我们称为“周山戎”。在历史上，以周朝为限，所谓“山戎”，无论生息地，还是人们共同体本身，都迥然不同。然而，由于名称相同，往往被混为一谈。笔者以此文对有关问题进行明确。

—

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2] (P.2879)}其中包含有关山戎的三个信息，即属于北方部族，存在于唐虞之前，同獫狁、荤粥是同一族群的别称。张守节《正义》指出，“荤粥”之“荤”音熏，“粥”音育，^{[2] (P.6)}其与獫狁是同一所指，^{[3] (P.583)}在文献中有熏育、^{[2] (P.113)}荤允^{[4] (P.2486)}等不同写法。司马贞《索隐》曰：“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汉曰匈奴。”^{[5] (P.6)}颜师古简明地指出“皆匈奴别号”，^{[4] (P.3743)}可以补充说明是不同时期的匈奴别号。《史记·黄帝本纪》载“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是谓熏粥早在黄帝时代已经存在，因而推断与其一起见载于史籍的山戎至迟在五帝初期已经存在。

探讨古山戎的居地，周人关于“北土”的说法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空间场域。《左传》载，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段记载是在周、晋争夺阎田时，周景王遣使对晋人所说的话，强调了周初疆域的扩展情况，其北部疆土得自商，周灭商之后，商的天下范围由周所接继，故而，肃慎、燕、亳成为周的“北土”。周人对于北疆的记述比较简约，往往以“北国”“北土”一言以

避之，实则涵盖了西北、东北，具体情况当依据文本语境进行分析。由于周的西土与武王克殷无关，故而北土是指东北。

对于周之“北土”范围的判断，学界有两种观点具有代表性：一是，认为“亳”在商代具有典型意义，“商王的都城，无论迁到哪里，都可以称为‘亳’”。因此，“武庚北奔，离开了周公的锋镝，到东北建国，仍名其都为‘亳’”。其国位于燕北肃慎南，进而推论古代的夫余与武庚所建之国有一定的关联。^[6]事实上，夫余是形成于秦汉时期^①的铁器时代的民族，其先人是青铜时代地处今吉林中部的“西团山文化”的主人穆。尽管在穆与夫余之中都掺杂有移徙而来的人口，但其族群主体是土著。在“西团山文化”之中有商文化的辐射映像，但它个性化的东西远远多于商文化因子，因而并不能纳入到商文化序列。二是，“燕”在金文中写作“𤣥”或“𤣦”，而“亳”亦即“貉”，𤣥亳即是燕貉，因而青铜器“陈璋壶”铭文中的“𤣥亳邦”即“燕貉之国”，推测“或许燕的辽西郡就是因袭貉人原先的主要分布区而置，辽东郡则是取地于原卫氏朝鲜。”^[7]貉（发）人的活动区主要在辽东而并不是在辽西；卫氏朝鲜的建立时间则迟至西汉初年，其所因袭的箕氏朝鲜从建置地域来看，也是并不在辽东，而是在朝鲜半岛大同江中下游一带。^[8]尽管上述二种探讨各自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对于传说时代东北原始族群位置的判定是有所启发的。北部疆域之内包含肃慎、燕、亳，大体是周初的现实，其中，“息慎”即“肃慎”，分布于不咸山（今长白山）的东北“发”也称作“北发”，^[9]是东北地区的貉人，居于肃慎之南，大体是在辽东地区；山戎的分布区在辽西，即今西辽河、大凌河流域。^[10]但除了本土也即“西土”而外，周的其他区域皆承袭自商，因而，肃慎、燕、亳也是商的北土。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到了周代，以“燕”置换了商的“山戎”，这是因为周天子在实行封建之

^① 关于夫余的形成时间，学界认识不一，但都在秦汉之间进行讨论。建立时间较早的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公元前3世纪建国，相当于秦末汉初。参见吴莲姬《夫余的建国及其对外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4期；二是汉武帝时期。参见程妮娜《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求是学刊》2014年第4期；此外，朝鲜半岛的汉籍文献《三国遗事》与《三国史记》分别认为是汉宣帝时期和汉元帝时期。

后，将燕分封于辽西的古山戎故地；同时，从族群的角度，古山戎在周初已经分化成为东胡、屠何、令支等新的人们共同体，并且孤竹、曩等殷人及其后裔纷纷将势力扩展至辽西地区。也就是说，至迟在周人接管殷商“北土”之际，辽西的古山戎已经成为“消逝”的族群。

从传说时代起，古山戎在辽西地区生活了五千余年。其与古肃慎、古发（貊）人以及北方的猃狁一样，皆同中原有一定程度的交流。虽然和所有上古以及早期文明史一样，由于资料不足导致其具体情况难以尽知，但从考古文化^①的发展脉络来看，其渊源以及交流性联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二

有关周代山戎的史事最早见载于《逸周书》，在记述周成王时期所召开的成周之会盛况的《王会》中记载道“山戎，戎菽。”晋人孔晁注云“山戎，亦东北夷。”另据《春秋》载，僖公十年（公元前650年）夏，“齐侯，许男伐北戎”。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84年）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齐人伐山戎”。杜预作注时称“山戎，北戎”。需要强调的是，文献中出现的山戎，除本文第一部分所涉及的几则史料之外，大多数情况下所指称的都是周代的山戎。

在秦晋争为强国的时候，秦与晋的周边族群成分较为复杂，仅以二者之北部考察可知“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2] [P.288]}这段史料所记载的是东周的历史，不过，林胡、楼烦、东胡、山戎等族群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存在。从诸侯国的位置来看，晋在西，其北方是林胡、楼烦；燕在东，其北方是东胡、山戎。以晋与燕作为参照物可知，林胡以及楼烦在西，东胡与山戎在东。然而，对于同东胡并存的山戎的确切位置，学界的认识较为模糊，其根本原因在于忽略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山戎”的内涵并不相同，明显的界线是周朝，山戎在其前后并非同一个族群实体，二者名同实异。围绕

山戎有下列几种误判性认识。

首先，从地域的视角出发，认为“山戎”与“东胡”是不同时代的辽西族群，前者在前，后者踵之，即山戎是东胡的先人。这种认知以不同的地域为判断核心，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由西喇木伦河来看，山戎与东胡皆是今西喇木伦河流域的主人，差别在于生活时间的前后相继。^[11]对于周代以前的山戎来讲，这一命题从宏观的角度是成立的。然而东胡却并不是古山戎的唯一后人。因为东胡最初的活动空间仅限于西喇木伦河流域，是古山戎的局部故地，随着不断拓疆，东胡南下之后才占领了古山戎的全部故地。但有观点认为，东胡的前身是春秋时期的山戎，在进入战国后称为东胡，^{[12] [P.34]}即周山戎是东胡的先人。这一判断所存在的错误非常明显，因为文本中常见的书写形式是东胡与山戎并提，比如《逸周书·王会篇》中就是将东胡和山戎并举，同时列入参加“成周之会”的东北夷的行列。这进一步说明，周山戎与古山戎是不同的族群。二是，由今大凌河为地理坐标来看，先是山戎居住于此，在齐桓公北伐之后，成为东胡的居地。^{[13] [P.187-188]}早在传说时代，今大凌河流域便活跃着以古山戎为主的原始族群。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古山戎分化，陆续出现了东胡、屠何、令支等族群。伴随着商代步入晚期，古山戎也走向没落。同时，殷的支系孤竹、曩等族趋势北渐，进入古山戎的南部地区，这一点由在该地所出土的殷商以及孤竹、曩的青铜器可以佐证。及周武王克殷，接管了商朝的“北土”，在接下来的“大封建”中，周的同姓封国受封于燕山以北，管理辽西各族群。孤竹、曩等辽西其他势力虽然也受封为“侯国”，但是，它们是属于燕国之下的次级侯国，这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比如辽西出土的青铜礼器上有燕侯赏赐曩侯的铭文。^[14]西周中期以后，礼崩乐坏，周王势微，不仅各封国纷纷变侯为王，北方各族群势力也相继崛起，并强势南下，尤其是燕北的山戎发展迅速，孤竹、令支等皆唯其马首是瞻，^[15]给燕侯的辽西控

^① 古山戎的考古文化通过考察周以前辽西地区的遗存可以大致了解。如小河西文化（公元前6200年以前），兴隆洼文化（公元前6200—前4470年），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公元前5200—前4470年），红山文化（公元前4710—前2920年），小河沿文化（公元前2900—前24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公元前2300—前100年）。

制与管理造成严重困扰，导致其左枝右梧，力不从心。

其次，从族群的视角来看，屠何是东胡的先人。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唐人尹知章，他在为《管子》做注时称“屠何，东胡之先也。”^[16] P.116 近代以来，学界大多支持这一认识，主张二者存在渊源关系，并从音韵学的角度判断，认为屠何、徒何与东胡，三者属于同音异写。^[17]或以周代土方为参照物，认为老哈河和牡牛河这“两土河”是夏、商土方的发源地，并为周代屠何、山戎所依，而古东胡也“世居”两土河之间的紫蒙之野，“两土河又是东胡的发祥地，因而从地理上又证明了东胡起源土方”。^[18]对于上述说法学界多有异议，认为其与《逸周书》以及《管子》等文献中有关东胡与屠何并列的文本相矛盾。“东胡与屠何应为并存的两族，屠何在今辽西，东胡则在今东蒙。”^[14] P.30 二者是同一时期共存的不同族群，而非存在承接关系的族群。同时，土方、獫狁、鬼方则是同族，其活动区域大体在今华北北部及内蒙古南部，古山戎和周屠何的地望均与辽西相关。前文已述，古山戎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分化为东胡、屠何以及孤竹。随着东胡的强大与扩张，在其向东南发展时，也同时兼并了屠何所在的区域，并使之融合或同化于东胡之中。

在宣王中兴之世，为缓解燕国对封内族群无力控制的困境，册封韩侯的后裔作为新的韩侯，并命他到“北国”经营秽、貊之地，协助燕侯治理东北，使周的封国在东北的颓势得到遏制。然而，燕与韩联手治理东北的情形维持时间并不长，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在犬戎等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西周灭亡，各诸侯的势力同步受到直接影响，燕国向南收缩，退至燕山以南，“韩侯之国”则土崩瓦解。

由于《史记·匈奴列传》等文献对于周代山戎的地理位置记述含糊，仅表明是在燕之北方，故而学界在燕北为山戎划定场域的时候认识不一。大体有四种认识，即山戎在：今燕山山脉

以及滦河至七老图山脉一带、今西喇木伦河（主此说者认为山戎即东胡之先）、今大凌河流域、无终（今河北省玉田县附近）。^[19] P.186 尽管这其中并未对古山戎与周山戎做明确区分，然而其所陈述的基本上是对周代东北族群的认识。

明确周山戎的地理位置，有必要参照已有的考古发掘成果。考古界在对辽西及冀北周代少数民族的青铜时代遗存发掘与整理时，将东胡同山戎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文化，其分布范围北限不超过北纬45°，一般集中于北纬44°30′以南，西喇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北的丘陵地带；南限在北纬40°以北，未过滦河与燕山；西南大体以七老图山为界，东部不过柳河与医巫闾山。^[20]而山戎文化则分布在东胡文化区之南。考古界在今北京延庆县境军都山地带方圆百里范围内，以及张家口市、滦平县境发现了山戎的遗址和墓葬，出土大量各式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大量青铜削刀。^①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周代山戎的四至大致是：北以七老图山与东胡为界，南以延庆为界与燕国相邻，西在张家口市以西同楼烦相接，其东以迁西为界与令支、孤竹为邻。西周时，燕国管理包括山戎、孤竹以及曷在内的辽西地区。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势力的衰弱，燕国的核心区大幅度向南回收，山戎乘势步步紧逼，成长为辽西的主导势力。

三

生活在辽西、冀北的山戎、孤竹、东胡等古代族群为古代中国东北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传说时代以及三代时期存留下来的文献有限，且中原史家素有“详内而略外”的记史传统，导致有限的记载存在文字简约、叙事简洁的特点，个别环节之间缺少必要的信息，甚至存在明显的误记，影响历史认识的客观与准确。同时，居于辽西的族群由于在历史上存在较大的变迁，所以在针对辽西的典型性文化遗存红山文化以及夏家店上下层文化的属性做判断的时候，存在误区。

^① 参见北京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第8期；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张家口市白庙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0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滦平县虎仁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7期。

一是，辽西早期文明的“先商说”，认为商文化起源于我国的北方，商先起源于幽燕。^①“先商说”引起东北学界的关注，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微，提出高句丽“源自殷商氏族”，“公元前1600年，汤率族众灭夏桀入主中原，一部分居民南迁，一部分居民留下来，成为东北各族的祖先”，“秦汉之际，东北的高句丽、夫余诸族，都应该是殷商遗民的后裔”。^{[21] (P.48,1)}对这种泛“先商说”以及东北诸族源于商人的认识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讨论。^②有学者依据七垣先商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分属于商民族先公时期的先商文化，以及商民族先王时期商代前期文化，指出“从下七垣先商文化至二里岗商前期文化再到殷墟商代后期文化，形成一个序列”，因此“商民族不起源于东北”，那么东北地区的古代族群起源于商民族的结论就失去了重要的前提条件。^[22]针对辽西文明的“先商说”进行否定的学者中有韩国学者，在历史解释过程中，将红山文化中的玉器与公元13世纪方见于文献的桓雄强牵在一起，指其为古代朝鲜文明，^[23]离本殊远。

二是，对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明属性判断不确切。较有影响力的认识有两种，即山戎文化，或东胡文化。前者在论证过程中，大抵将山戎与东胡视同为同一民族，即山戎与东胡是同一族群在不同时代的称谓：春秋时称山戎，战国时称东胡。^[24]然而东胡在西周时期已经活动于西喇木伦河、老哈河，以及老哈河与大凌河之间了，^[25]因此这种认识是不成立的。综合来看，笔者赞同“东胡文化说”，不仅在于考古界已经明确了燕文化、匈奴文化以及东胡文化各自的本质特征，而且以周为限的两支以“山戎”命名的势力也并非同一时空之下的同一族群。古山戎早于东胡而存在，或者说，东胡是从古山戎中分化出来的人们共同体。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到了周代，山戎与东胡同时存在，并且各自拥有自己的居地，也分别具有不同的考古文化，是彼此完全不同的族群。其历史发展脉络也有明显差别。因

而，古山戎与周山戎仅仅称谓相同，具体所指截然不同。

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年），为解决北部边患，出兵讨伐山戎及其属国孤竹、令支、屠何等辽西族群，齐国取得胜利，此后这些族群势力不再见载于史。然而，地处西喇木伦河一带的东胡是否也同时被齐桓公所征服却难以稽考。在《管子·小匡》中有记载：齐桓公“败胡貉”。但是，这里的“胡”并非是东胡的简称，而“貉”也不是指称貉族，“胡貉”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指。^[26]这种情况在文献之中颇为常见，另如“蛮貉”“夷貉”也都不是确切地指称某一民族，而是泛指北方或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27]因而，不能单纯依据《管子》的记载，而顾名思义地认为东胡在齐桓公北伐时，与其兵刃相接并在失败之后服属。在目前的资料背景之下，我们认为齐与东胡没有交锋。因此，相比于辽西的其他民族，东胡的实力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并趁辽西各族在齐的讨伐之下一蹶不振、燕人尚在整饬粮草，尚未拔营北进之机，迅速南下攻掠，占领了古山戎故地，同化了辽西的孤竹、令支、屠何等部族，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强大的东胡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周朝来自北方的不稳定因素。

直到燕昭王执政时（前311-前279年），派遣贤将秦开击败东胡，迫使其退回到西喇木伦河一带的故地。为了加强管理，燕人在失而复得的辽西地区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四郡，在辽东貉人居住区设置了辽东郡。同时，在五郡的北边修筑长城。据《史记·朝鲜列传》载，燕的疆域向南一直达到涘水（今清川江）北岸，与周的另外一个侯国“朝鲜”为邻。

辽西是中原通往辽东以及朝鲜半岛的重要陆上通道，各族群势力在这一带的演绎错综复杂，兼之文献“不足征”，所以尽管研究成果较多，但含混甚至错误认识多有存在。无论是发、山戎、古肃慎这些土著的原始民族，还是朝鲜这类

^① 参见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复刊号；于志耿等《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郑伯昂《论红山文化非商先文化：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商榷》，《商丘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② 参见张碧波《中国高句丽史研究的新收获——评〈中国高句丽史〉》，《东北史地》2004年第2期；金延龄《也谈高句丽民族的起源》，《东北史地》2004年第2期；刘子敏《评高句丽源于“商人说”》，《博物馆研究》2010年第3期。

具备移民因素的部族，都存在非常大的认识误区，其中最大的困扰在于个别族群的动态发展与文献记载中的“名称”的不同步，这其中既包含对族群或政治势力所处地理空间的不同判断，比如对古朝鲜的位置，存在辽西、辽东、朝鲜半岛等不同认识，学界用“移动说”将各种解读含糊地一言以蔽之，牵强成为一套“话语体系”；也包含对名同实异的族群“望名生义”，比如不加区分地将“山戎”视同为一，愈解愈惑。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其与文献彼此佐证，使问题得到了越来越明朗地澄清。山戎、肃慎以及发等土长土生于东北的原始性质的人们共同体，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后，随着人

口的流动、文化的辐射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族群经历了复杂的分化和重组，然而由于这个动态的过程与名称的准确对应并不同步，往往存在名虽相同，实则不符的情况。若不加区分地以名索骥，所建构出来的话语体系无疑与客观历史相悖。值得关注的是，各族群在移居东北区域之后，皆与土著人口融为一体，固有的族群特征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如箕子是殷朝遗民，在率领族众来到朝鲜半岛之后，与当地土著良夷融合成为“朝鲜蛮夷”，而不是华夏。同样，山戎与其他辽西族群融合而成为新的民族体，而不再是山戎。这也是历史上众多古族“消失”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左丘明. 左传 [M]. //十三经注疏: 第4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2)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 王国维. 鬼方昆夷獯豸考 [J] //观堂林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4)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5)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6) 顾颉刚. 三监的结局——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三 [J]. 文史. 1988, (30).
- (7) 林云. “燕亳”和“燕亳邦”小议 [J]. 史学集刊. 1994, (2).
- (8) 苗威: 古朝鲜研究 [M]. 香港: 亚洲出版社, 2006; 刘子敏. 谈古文献标点断句与古朝鲜地望之研究 [J]. 东疆学刊. 1995, (2).
- (9) 傅朗云. 东北发族源流及其活动地区索证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5, (2).
- (10) 刘子敏. 肃慎族源、地望辨 [J] //韩国景园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编. 东亚文化研究, 2000, (4).
- (11) 刘观民、徐光冀. 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1, (1).
- (12) 张博泉. 东北地方史稿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5.
- (13) 孙进己等. 东北历史地理 (一)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14) 北洞文物发掘小组 (喀左县文化馆, 朝鲜地区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等). 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 [J]. 考古, 1974, (6).
- (15) 刘子敏. 也谈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 [J]. 史学集刊, 2005, (4); 苗威. 山戎、东胡考辨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8, (4).
- (16) 戴望. 管子校正 [M] //诸子集成.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7) 冯家昇. 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 [J]. 禹贡. 1934, (2-7).
- (18) 金岳. 东胡源于土方考 [J]. 民族研究. 1987, (3).
- (19) 孙进己等. 东北历史地理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20) 靳枫毅. 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 [J]. 考古学报. 1987, (2).
- (21) 耿铁华. 中国高句丽史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 (22) 李德山. 再谈高句丽民族的起源 [J]. 东北史地. 2006, (3).
- (23) 朴仙姬. 흥산문화 유물에 보이는 인장의 기원과 고조선문화 [J]. 비교민속학. 2012, (49).
- (24) 王成生. 辽河流域及邻近地区短铤曲刃剑研 [J]. 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 [M], 1981; 迟雷.

- 关于曲刃青铜短剑的若干问题 [J]. 考古. 1982, (1).
- (25) 靳枫毅. 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 [J]. 考古学报. 1983, (1).
- (26) 苗威. 山戎、东胡考辨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8, (4).
- (27) 刘子敏. 貉族考 [J]. 北方民族. 1996, (1).

The Name of Shanr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th the Same Name in Early Liaoxi

MIAO Wei

(School of Northeast Asia Studies , Shandong University , Weihai , Shandong 264209)

[Abstract] Shanrong w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original ethnic groups in Northwest China , living in the area of Xiliao River and Daling River. In the Zhou Dynasty , the residence of the ethnic groups named Shanrong moved to Qilaotu Mountain , Yanqing , west of Zhangjiaokou and Qianxi , and the ethnic groups changed. So , Shanrong is divided into Ancient Shanrong before the Zhou Dynasty and Zhou Shanrong after the Zhou Dynasty. Their decomposition and recombination were the results of both the original ethnic groups themselves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times.

[Key words] Shanrong; liaoxi , Zhou

(责任编辑 张子新)